

疫情是種族歧視的一面照妖鏡： 新住民與新二代面臨的困境與 臺灣社會應有的省思

楊浩然*

一個聚會的場合，朋友提到她的胞兄在美國罹患新冠肺炎。在醫院走廊等候病房時，因為感到寒冷，數度向護理人員索討禦寒棉被。沒想到這個簡單的要求，竟然從早上等到晚上，沒有得到任何一位護理人員的回應，甚至腳步都沒有停留一下，正眼也沒瞧一下。儘管上述情況的產生有很多可能性，然而朋友一家人十分篤定，是由於胞兄膚色氏族的緣故，才會受到這般忽視與對待。很難理解，在強調多元族群融合的美國社會，種族歧視的劇碼卻一再上演。

事實上，在面對嚴峻的疫情時，真正考驗的是人性，實際考慮的是身分，各國各族皆然。當疫病威脅到個體的生存、限縮了個人在社會結構中所擁有的資產，透過社會團體與社會關係網絡來重新分配資源，便是很自然的反應¹。臺灣的新住民與新二代，也面臨同樣的困境。在 2020 年中，新冠肺炎疫情趨緩之際，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曾經一度以中國大陸疫情仍不明朗為由，禁止陸配子女（亦即所謂的「小明」）回臺。然而，同一時間武漢臺商不僅可以回臺，甚至不需要集中檢疫。面對媒體的質疑，指揮中心的說法是「武漢臺商是國人且有居留證，其他則是身分別管制問題，而不是移動風險問題」。顯然是否具有國人之身分才是整件事的關鍵。不過，根據我國國籍法之精神與規定，新二代出生即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亦為本國國民，是道道地地的「國人」，以身分別管制來解釋此一事件，似乎過於牽強。此外，從指揮中心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告之「限縮非本國籍人士入境及檢疫規定」中，將持有居留證國人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歸類於「非本國籍人士」的作法，便不難理解，臺灣社會從上到下，對於新

*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¹ 這個觀點來自於社會網絡理論 (social network theory)。社會網絡的基本概念，是指個人與外界接觸形成人際網絡，在此一網絡中，個人得以維持身分，並獲得情緒、物質、訊息之支持，和新事物接觸之機會。社會網絡的作用常以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的角度加以理解，另外也包括了弱連結理論 (weak tie theory) 及結構洞 (structural hole) 的核心概念。

住民與新二代的身分認同，仍然停留在「外人」與「過客」的階段。事實上，這樣的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導因於臺灣獨特地緣政治之歷史糾葛，在國家認同與族群政治的大纛之下，建構出明顯的社會分類，而這種分別彼此的區隔，在陸籍的新住民與新二代中，尤為明顯。舉例來說，臺灣政府對於陸籍新住民的居留及移民，相較於東南亞其他國家原生國籍的新住民，均採取較嚴格的規定，因此她們取得身分證的比例與速度，均不如其他國籍新住民。此外，由中央研究院主導並執行的「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發現，臺灣民眾對於東南亞原生國籍之新住民婦女取得公民權的態度，較陸籍新住民婦女更加開放（陳玉華、伊慶春，2015；陳志柔、吳家裕，2017）。這就不難理解，為何陸籍新住民婦女雖然在臺灣沒有語言障礙的文化適應問題，卻更能感受到社會歧視的氛圍。

新二代即使出生於臺灣，並在臺灣成長，仍被一般人視為外國人。這種被 Armenta 等人（2013）稱之為「外籍成見」（foreigner stereotype）的現象，一直以來在臺灣社會以一種隱諱的方式展現在一般民眾的生活當中。我們以戲謔的綽號、雙關的詞語來稱呼新住民族群；並根據少數幾則媒體新聞報導，或是鄰里間茶餘飯後的閒談，來以偏概全地定義新住民團體及臆測他們的行為。這些不易察覺，甚至沒有意識到的「微歧視」（microaggression），充斥在我們周遭，一時之間對於我們也許無關痛癢，然而對於新住民與新二代而言，卻影響至深。這種有意無意的微歧視，經過長久的累積，形成了族群之間一道隱形的距離，不利於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其中新二代的氏族認同發展，便是一例。

一些研究與教學現場的報告指出，新二代對於其母親氏族與文化的認同不盡一致，但對於自己身為臺灣人的認同，卻幾乎沒有疑義。問題在於，他們的同學、同學家長、老師、學校行政人員、或是社區民眾，可能並不如此認為。這種氛圍與偏見，形成了一股隱藏的社會排斥推力，將新二代從人際中邊緣化。由於這股社會排斥的推力，追根究柢仍是緣於其新住民母親之故，因此也造成部分新二代刻意切割或詆毀母親的事件，形成家庭親子相處的問題。筆者數年前在田野調查的現場，曾經聆聽一位新住民母親哭著訴說自身的遭遇：雖然平日受到部分民眾的歧視貶抑，但她都能夠隱忍。但是當她有一天發現自己的孩子用同樣的話語及口氣對待自己時，她再也無法承受。後來經過瞭解，孩子是因為想要融入班上同學的朋友圈，但同學對於新住民族群的態度有偏見，為了取得同學們的認同與接納，因而複製了他們的態度及語言。

事實上，新住民婦女及新二代在認同的議題上，都被汙名化的框架所限制，但卻存在不同的脈絡。新住民婦女認同的歷程，主要受到公眾汙名化（public stigmatization）的標籤左右。在臺灣，新住民的氏族背景不但沒有帶來多

元文化觀點的優勢，反而成為社會融合的包袱。這種社會排斥的遭遇，看在新二代眼裡，潛移默化而深刻地影響他們對雙文化認同 (bicultural identity) 的接受程度。大多數的新二代並不欣然擁抱母親的原生文化，從他們很少能夠操持母親母國語言便能部分得到印證，這種現象與其他地區移民第二代所呈現的「雙語優勢」(bilingual advantage, Bialystock, 2015) 截然不同。一些報告甚至指出，臺灣新二代的家庭不鼓勵子女認同母親的國家與文化，因此完全談不上雙重文化的優勢 (楊艾俐, 2003)。新二代隱藏、不揭露身分的原因，多半來自擔心刻板印象帶來的社會距離，會影響他們社會網絡的建立及社會資本的取得。由於充斥在社會上的臺灣優越感，以及族群政治下的社會距離，使得新二代甚至覺得沾上新住民的邊，都會烙印上各方面比較不如人的印記，甚至會樹立起社會網絡與公民權利的障礙。這種心態無疑地已經陷入從公眾汙名化的標籤，進一步內化成自我汙名化 (internalized stigmatization)² 的惡性循環。而這個機制的運作，以及其帶來的影響，常常隱而未現。

大多數針對移民第二代的研究指出，強烈的氏族認同感是心理健康的保護因子，建立雙文化認同的整合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似乎是提升其心理健康的合適方法。不過，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氏族認同感反而會成為兒童青少年心理或行為問題的危險因子。譬如 Williams 等人 (2014) 發現，青少年移民在面臨高度歧視的環境中，強烈的氏族認同反而是招致其違紀行為 (delinquency) 的危險因子。子女氏族認同感的建立，主要來自於父母教導子女關於自身氏族的起源與歷史，以及如何因應歧視或是氏族偏見 (racial bias) 的過程，這個過程對雙親而言，也是氏族社會化 (ethnic-racial socialization) 的一環。一般而言，雙親的氏族社會化程度高，有助於提升移民第二代的心理健康；但也很可能在此一過程中，移民第二代對自身的氏族產生負面的認知或包袱，而戕害了其心理健康。而後者的情況正是臺灣新住民婦女與新二代面臨的困境。高度歧視的環境與不被尊重的氏族文化背景，使他們的身分成為沉重的負擔 (Yang et al., 2014)。

其實臺灣新二代的歧視經歷，最早可能是在家庭中目睹母親受到家庭其他成員的對待。新住民婦女在家庭中被矮化、視為外人或勞力提供者，沒有獲得應有的角色尊重，呈現出權力不平衡的互動關係，甚至造成「負向適應」(negative acculturation, Lien et al., 2021) 的結果，這種經驗使得新二代在文化認

² 「公眾汙名化」與「自我汙名化」二個社會心理學名詞，主要應用於精神疾病研究領域。前者指稱一般民眾對於精神疾病之負面刻板印象持認同的態度；後者則表示精神疾病患者對自己的疾病產生內在的刻板印象與偏見，進而降低自身之自尊與自我效能 (引自陳依煜, 2014)。然而除了精神疾病之外，氏族亦為一常受到汙名化之標的，故本文借用此一概念加以延伸論述。

同上產生迷惘，也容易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不適應。不幸的是，這種受到歧視的劇情不僅在家庭中上演，也在家庭外的場域得到印證。研究發現，臺灣新二代不乏場域歧視的經歷，包括：從行政人員或老師而來的歧視、學校制度衍生的不公、環境設施不友善引起的自覺歧視經驗（陳菀茹，2012）。而當歧視升級到場域層次時，階級化的社會分類便已不再是隱藏的訊息，而是公然操作的社會排斥。這些場域的歧視，常常越過理性與客觀的邊界，向人權伸出魔爪，就像「小明們」的遭遇一樣。

面對疫情時，決策者常常面臨「人權」與「公共衛生」孰先孰後的兩難。然而，類似疫情控制這種需要高度專業判斷的議題，倘若受到優勢政治態度的「團體迷思」所干擾（賴俊雄，2021），不純然就科學線索與專業意見訂定決策，而摻雜了團體價值與意識形態的元素，就不免產生「結果偏誤」的下場，以疫情控制完善的理由，合理化剝奪部分民眾人權的行為。

團體迷思的破除，有賴族群之間的彼此瞭解與尊重。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團體間接觸一直被認為是改善團體間關係的最有效的心理學策略之一，可以有效地減少團體間的偏見和衝突（Dovidio et al., 2003）。社會接觸愈頻繁，族群之間的瞭解愈深，愈能夠彼此接納包容，達到縮短社會距離的目的。不過，過去針對外省第二代的研究指出，即便是出生在臺灣、生長在臺灣的外省第二代，雖然與閩南及客家氏族有頻繁而長期的接觸，他們在臺灣與其他族群仍然存在明顯的社會距離（王甫昌，1993），這種社會距離在選舉期間或是公民權利的賦予時，尤其明顯。相似的例子也出現在新住民婦女在臺灣爭取公民權一事上：社會接觸的多寡，對於新住民婦女透過婚姻取得臺灣的公民權，並沒有顯著的效果。實際上左右此一結果的因素，是國家認同與族群成見等族群政治的因素。因此，對於來自日本和歐美等工業國家之新住民配偶，儘管社會接觸機會更為有限，但臺灣民眾在各種權益的賦予上，卻反而持正面的傾向（Tsai, 2011）。這種根據婚配對象來源地之社會發展程度而有差異的態度，反映出新住民在臺灣的差別地位。這些結果強調，僅僅團體間的接觸不足以改善團體之間的關係，甚至可能加劇偏見；在接觸情境中擁有平等地位及共同目標，才能有效減少偏見。

對於新住民團體的認識與瞭解，臺灣社會與教育系統目前提倡的接觸方法，仍舊是由歷史背景與文化認知來加強臺灣民眾與新住民族群間理解的策略。譬如：在小學增加東協國家語言課程、透過政府與民間團體辦理異文化節慶或活動等。這種由歷史的脈絡及巨觀視角的互動，可視為「脈絡接觸」（contextual contact）或「偶然接觸」（causal contact）的一種形式（Allport, 1979）。

這類的接觸固然是增進族群理解的重要手段，然而表面的接觸無法建立具有信任感的依賴關係，缺乏個人化經驗基礎的文化政策，對民眾提升對新住民認同的效果有限，因而社會仍然瀰漫著與新住民互動的不確定性，從而盡可能迴避與新住民族群成員的接觸。反之，提升人與人之間親身接觸的「行為接觸」(behavioral contact) 或是「實質接觸」(true acquaintance)，是增進族群彼此瞭解不可或缺的關鍵方法。透過個人化交流中產生的信任感，可以減少焦慮與不適；同時，這些過程提供了一個機會消除對不喜歡團體的刻板印象、增加積極的情感聯繫，藉由增強對另一團體成員的同理心來減少偏見，亦即：關注這個人的感受（高同理心狀態）而不是問題的本身（低同理心），從而打破外團體均為同質單位的單一看法。

就接觸的態度而言，許多社會接觸學派的學者一致地指出，如果團體之間能夠：(1) 維持在接觸情境中的地位平等；(2) 彼此積極互相合作；(3) 具有共同的目標；以及 (4) 獲得當局、法律或是習俗的支持，那麼正向的團體關係發展是可以期待的。從這些線索可知，當前的臺灣社會在疫情的威脅之下，每一個團體彼此之間都是相互依存的關係，更應該學習放下狹隘的臺灣優越感，摒棄種族與社會階級的尺規，將新住民與新二代確實視為臺灣的一分子，給予平等的地位與機會，不再將新住民與新二代視為競爭社會資本與剝奪工作機會的對象，而是帶來多元文化與人力資源的合作伙伴，一同打造夢想之地，分享富足而溫暖的社會經濟成果。此外，透過外部機制建立一個能夠避免外顯歧視的制度，用法規規範不當的言語與行為，也是可以考慮的作法。

過去三、四十年中，臺灣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迎來了超過 50 萬個新住民家庭，不僅充實了臺灣的人口結構，並提供充沛的勞動生產力，展現了豐富多元的文化經驗，對於臺灣整體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具有莫大的貢獻。然而，民眾對於新住民與新二代的認識與接納，仍然普遍不足，甚至存在相當的距離感與偏見。而在疫情的催化之下，這些隱藏的微歧視，透過臺灣優越感的發酵及族群政治的操作，演變成堂而皇之的社會排斥，不僅戕害族群和諧，對社會的發展亦有所阻礙。事實上，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只有先來後到的差異，沒有內外你我的分別，大家都是為著讓自己與下一代擁有一個更富裕而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在這個共同目標下，族群之間應該建立更深刻而積極的合作關係，透過實質接觸——而非僅止於脈絡接觸——破除社會分類的窠臼，擺脫符號政治 (symbolic politics)³ 的框架，消弭政治態度凌駕社會接觸的效果，尊重多元

³ 符號政治指的是個人對公共政策的態度並非經過理性考量的結果，而是根據日常生活中所吸收的話語、價值、意識形態，在個人認知體系中建立了反射性的刻板印象，繼而影響個人對公共政策的選擇(引自陳至柔、吳家裕，2017)。

文化的存在與發展，平等對待不同氏族背景的個體，增進情感與信任，提升族群間的凝聚力，共同擘劃雙贏的未來藍圖，打造一個互助共好的環境。如此，我們不僅可以安然度過新興的疫情，也能夠逐漸擺脫社會的瘟疫。

參考文獻

- 王甫昌 (1993)。〈族群通婚的後果：省籍通婚對於族群同化的影響〉，《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6 卷第 1 期，頁 231-267。
- 陳玉華、伊慶春 (2015)。《臺灣民眾對於婚姻移民的社會態度》，2015 台港社會學與社會意向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陳至柔、吳家裕 (2017)。〈臺灣民眾對外籍配偶移民的態度：十年間的變化趨勢 (2004-2014)〉，《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9 卷第 3 期，頁 1-38。
- 陳依煜 (2014)。《大學生精神病去汙名化介入成效初探》(未出版碩士論文)，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 陳莞茹 (2012)。〈看不見的存在——檢視學校中對新移民子女的偏見〉，《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1 卷第 8 期，頁 35-37。
- 楊艾俐 (2003)。〈臺灣之子：臺灣變貌新移民潮〉，《天下雜誌》第 271 期，頁 95-99。
- 賴俊雄 (2021)。〈批判思考：後疫情「兩難」時代的智慧與愛〉，《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22 卷第 2 期，頁 17-22。
- Armenta BE, Lee RM, Pituc ST, Jung KR, Park IJK,...Schwartz SJ. (2013). Where are you from? A validation of the Foreigner Objectification Scale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rrelates of foreigner objectification among Asian Americans and Latinos. *Cultural Diversity &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19: 131-42.
- Allport GW. (1979).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Cambridge, MA: Addison-Wesley.
- Bialystok E. (2015). Bilingu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 the role of attention.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9: 117-21.
- Dovidio JF, Gaertner SL, & Kawakami K. (2003). Intergroup contact: the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 *Group Process & Intergroup Relations*, 6: 5-21.
- Lien MH, Huang SS, & Yang HJ. (2021). A pathway to negative acculturation: Marital maladjustment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ngth of residenc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 *BMC Women's Health*, 21(1): 190.
- Tsai MC. (2011). Foreign brides meet ethnic policie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5: 243-268.
- Williams JL, Aiyer SM, Durkee MI, & Tolan PH. (2014). The protective role of ethnic identity for urban adolescent males facing multiple stressor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3: 1728-41
- Yang HJ, Wu JY, Huang SS, Lien MH, & Lee SH. (2014).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 *Archives of Women's Mental Health*, 17: 359-366.